

86039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K250.6
1030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76印张 2插页 174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72·173

定 价：1.25 元

目 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津十五烈士·····	董振修 (1)
解放前国民党天津市地方组织 的活动概况 ·····	谢天培 (12)
回忆《新民意报》·····	刘嘉谔 (36)
孙中山先生北上和《新民意报》·····	慕小岑 (51)
我和《华北新闻》·····	周拂尘 (55)
张作霖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关系 ·····	赵兴德 李赞廷 (81)
张作霖二三事 ·····	汤国桢 (111)
张作相平生事迹之回忆 ·····	崔晓峰 (118)
英美烟草托拉斯对天津的经济垄断·····	哈增礼 (130)
天津租界里的“皮包洋行”·····	贾志奇 陈宝清 (145)
美商公懋洋行在中国的活动·····	高敏时 李少伯 (155)
天津外商银行简介·····	李焕章 刘嘉谔 (172)
天津相声史话·····	薛宝琨 (187)

京津相声演员谱系……………马三立 (205)

解放前的天津南市概况……………周恩玉 (216)

	五四时期的天津爱智学会……………孔赐安 (11)
	《河北新闻》报……………王 木 (50)
补	天津《征信新闻》……………孙新源 (54)
	小说家刘云若……………阿 吉 (80)
白	颐中烟草公司见闻点滴……………吴季虎 (144)
	靠庚子赔款起家的武斋洋行……………李松年 (154)
	黎元洪与北塘早期教育……………于 辉 (248)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津十五烈士

董 振 修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发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斗争形势，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在斗争中，有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地为革命献身，其中包括一九二七年在天津被反动军阀杀害的十五烈士。现将江震寰等十五烈士的事迹，整理成文，以示纪念。

一、天津革命活动的据点

——义庆里四十号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在天津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于方舟，作为直隶省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江浩也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们回到天津开展工作。于方舟着手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天津地委，并迅速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现为南京路义庆里二十一号）筹建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省、天津市两个执行委员会机关（简称省、市党部）。不久地委机关也迁入义庆里四十号。当时根据革命工作

的需要，党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于方舟、江浩都在省党部任执委，江震寰任市党部常委，地委同志都担任省、市党部委员。地委书记于方舟以及安幸生、卢绍亨等都住在义庆里四十号，江浩、邓颖超等也常来这里开会。这里来往人员及信函很多，逐渐形成了半公开的革命交通联络据点。共产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国民党的活动有时是半公开，有时是公开的，所以很快就引起了英租界当局和反动军阀的注意。

在大革命时期，天津的国共两党的活动，或以国民会议促成会，各界联合会、总工会、学联的名义，或以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名义，广泛发动各界群众，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就散发了大量传单，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解决国家大事。国民党省、市党部还以各种纪念日的名义或结合某些重大事件，召开纪念会，散发传单，作宣传鼓动工作。国民党的许多活动、会议、传单、启事等，都在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做了许多指导党员和唤醒民众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底，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入津后，国民党的活动公开了，于是将设在义庆里四十号的国民党省、市党部迁至老铁桥大东旅社，共产党和共青团地委、总工会、妇联也迁到这里，义庆里四十号一度停止使用。

这一时期，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或说以此名义）组织了几个重要活动。

①国民军入津时，国民党员持旗游行，张贴黄报，欢迎国民军，欢迎被奉系军阀逮捕的各团体十几位代表出狱，向各代表赠纪念旗，旗上写着“为爱国运动而被捕的民众代表出狱纪

念”及“革命先锋”。

②每天派国民党员数十人到街市讲演，作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收到良好效果。

③省、市党部联合召开各团体国民大会筹备会，于方舟任主席。该会议定各团体联合起来，召集国民会议，催促组织国民政府。与会三十四个团体代表各推一筹备员，有江浩、袁子贞、李志新、江挹清、于兰田、王南复、李立三（李锡九）等三十四人，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事宜。

④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全体党员会，到会二百多人，辛璞田任主席，江浩、于方舟、杨衡南、谢曦等作报告。会上改选了市党部，即：常务部委员辛璞田、组织部委员杨衡南、宣传部委员郑重谋、妇女部委员赵达、青年部委员于兰田、农工部委员安幸生、书记委员谢曦。大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并表示反对“西山会议”，公决请国民党“二大”开除右派林森、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三月七日，国民党在津党员五百多人召开大会，仍由辛璞田任主席。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及总理逝世周年纪念筹备报告等。会上还选出席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其中有郑重谋、郑铁山、吴晓天、何雪、于兰田、于树珊、满子亮、谢曦、于少泉、孙一山、蒋益、江挹清、张贵祥、李铁钧、于炳祥、唐宝耀、周宗莲、陈奕涛、唐浩等。

此外，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辛璞田还在反张（作霖）排日团招待各界时讲话，表示天津全体国民党员支持反张排日团“情愿同心合作到底！”

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直鲁联军的夹击下，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

转入地下，于是又恢复使用义庆里四十号这个老据点。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就设在这里，由江震寰负责，开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动，达八个月之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市党部机关遭查封，党员被捕，义庆里四十号才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奉系军阀镇压革命，国民党 天津市党部遭到破坏

大破坏、大逮捕的准备 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天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四月十九日，直隶督办褚玉璞在天津设立了镇压人民的“直鲁联军密探处”，捕捉革命党人。接着，天津警察厅取缔“宣传赤化”的报纸。到了七月，报上便登出“严禁共产党的宣传”、“当局严防宣传赤化”一类的消息，为镇压开始制造舆论。其后直隶省当局下令严防共产党活动，如发现共产党机关应立即破获。省会天津军警督察处、警察厅、第二方面密查处各派侦探严行查缉，重点放在工人、学生当中。十月，在裕大纱厂捕获国民党员三人，在密查处严刑讯问下，被捕者背叛革命，泄露了国民党在津活动的内情，向敌人出卖了首领名单；同时，密查处侦探耿某又得到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姓名底册，立即向警察厅长作了报告。就在这个月，保安司令部获得“共产党人在各租界设立机关、秘密活动”的密报。于是，交涉公署立即照会各国领事：对赤党机关，予以协助查禁。随后，大破坏、大逮捕在天津开始了。

大破坏、大逮捕的过程 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当局勾结英租界工部局，由工部局出面，搜查封闭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义庆里四十号，并进行大逮捕。革命据点从此就被破坏了。

二十三日午，英租界工部局派巡捕偕同中国便衣侦探二人，前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查抄，封闭了机关，先将在机关办公的党员江震寰、邬集中、王纯善、马增玉四人逮捕，接着搜索机关，搜出国民党党纲、孙中山演说集、青天白日旗，大小印信及许多宣传品、文件等，连人带物一起送英工部局。同时，派巡捕侦探在义庆里四十号窝底，以便逮捕前去机关的同志。

江震寰等被捕后，在《华北晚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及时在晚报上发了消息，便于同志们闻讯从速躲避起来。接着，几家日报也登出消息。但由于有些同志当时没有看报，仍到义庆里四十号去，几天之内又有十几位同志先后被留守在那里的巡捕和便衣特务逮捕。为营救被捕的同志，由他们的家属出面，聘请美国律师法克斯，向工部局提出交涉，请其保护。

引渡事件的前前后后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逮捕之后，警厅外国顾问丁麟德立即向英工部局要求解送中国官厅，遭到拒绝。十一月二十四日晨，直隶交涉员庄景珂赴英工部局要求向中国官厅引渡，又遭拒绝。上午九时，工部局审讯，美国律师法克斯亲往据理辩护，谓：该党员等是政治犯，按国际惯例，应予以保护，绝不能向中国官厅引渡。英工部局承认此议，当时表示拒绝向天津警察当局引渡，并对美国律师说，被捕人员将获释，市党部也准备启封。在这种情况下，褚玉璞遂命交涉署致电北京军阀政府外交部，由外交部向英国公使馆提出交涉引渡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国工部局总巡派员对被捕者进行调查，证明他们确是国民党员，而查抄的书籍文件，也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政治周报》，还有孙中山

铜像四大箱。英国当局原不打算引渡，但鉴于军阀当局几次派人向英国领事严重交涉，直至通过外交部交涉，英国方面妥协了，遂用两辆汽车将被捕者当中的十四人引渡到天津警察厅，所有国民党员名册也交给了警厅。事后，报纸上公布了这十四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不少错误）。除引渡者外，尚有四人仍暂留工部局。对此引渡事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报》写道：“此次为本埠租界外人允许引渡中国党人之第一次，实为从前所未有。”

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引渡到天津警察厅之后，即由司法科长何朗西审讯。翌日，警察厅长丁振芝、科员高敬成严刑审讯，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丁振芝将破获及引渡情形，及时报告直鲁联军各重要将领。山东保安总司令张宗昌用“特急”“宜密”电丁振芝，表彰他“在英界破获宣传赤化机关，具见侦察灵捷，办事认真，深堪嘉尚”，指示“所有破获之犯，着即分别首从，尽法惩治”，以后“随时严密侦察，详细具报”。由此可见反动军阀面目之凶！

广州政府对英国当局的抗议 为天津英国领事引渡事件，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曾致电英国政府外交部，抗议天津英国租界当局拘逮国民党人并引渡给奉系军阀，要求赔偿损失，声明倘若被捕诸人受害，将由英国政府负责。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也刊载题为《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意义》的署名文章，指出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长反动势力的根据地”。但英国政府对此却置若罔闻。

当时，党立即组织营救工作。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委、中国共产党党员江浩闻讯后，立即筹款，并派王积衡回

津营救。临行前，江浩对王说：“你赶快回去组织营救，不要只营救震寰一人，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

三、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

十五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被捕引渡的江震寰等十四位同志及被第二方面密查处逮捕的王益三同志，共十五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人士，由警厅转到天津卫戍司令部。他们遭受惨绝人寰的严刑拷讯，毫不屈服，表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清晨，即南方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第六天，北方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与之呼应，下令将江震寰等十五位同志，以在天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所谓罪名，予以枪杀。在开赴南市刑场途中，英勇不屈的革命志士们高呼革命口号，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使街头的群众受感动而泪下。在刑场上，江震寰等同志在敌人刀枪面前，表现出临死不畏的革命气节，巍然挺立，再次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牺牲，表现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成为天津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十五烈士与十七烈士之别 几年之后，即一九三一年，天津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立碑纪念烈士，但碑上写的却是“十七烈士纪念碑”。碑名为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鲁荡平题字，碑文由国民党市党部刘不同撰写。明明是十五烈士，怎么又出来十七烈士？这一点在碑文上有所记载。碑文中除记述了十五烈士之外，另将死于一九三〇年的国民党员张志金、王弢楼二人

补入，而成了所谓十七烈士，当时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十七烈士追悼录》的小册子。这种作法是别有用心的。大家知道，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党新军阀为了争夺军政大权，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一九三〇年导致了北方各派军阀联合反蒋的斗争。刘不同所写的张志全、王弢楼烈士，是蒋系在反阎（晋系军阀阎锡山）的斗争中身亡的，纯属新军阀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绝不能作为革命烈士，也绝不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革命献身的十五烈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当时国民党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美化自己，欺骗人民罢了。

十五烈士的革命事迹 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为民族为革命而死，应该很好地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现将搜集到的一些文字及调查材料，加以整理，作一简要介绍：

（一）**江震寰**（1904—1927），或写江镇寰、江振寰，化名赵遵三，江浩之子，河北玉田县人，毕业于滦县师范学校。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尔后加入国共两党。一九二四年六月，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九月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十月回国，在天津以扶轮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兼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其间一度调大同工作），从事工运、青运和国共统一战线工作。遇难时年仅二十三岁。

（二）**王纯善**，浙江人，天津私立商业学校学生，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党，任党部宣传干事，常到各校联络同志，组织学生自治，从事革命活动，牺牲时年仅二十岁。

（三）**赵品三**，又名赵玉良，唐山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国

民党，任宣传秘书，秘密奔走各校，联络和发动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牺牲时二十九岁。

（四）**邹集中**，广东香山县城里人，天津商业学校学生，曾在德州电报局工作，不堪压迫来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市党部常务干事，常住机关，遇难时年仅十七岁。

（五）**马增玉**，河北平山县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一九二四年在正定省立七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一九二五年春，在正定设石印局，秘密建立机关，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中学毕业后来津，开展革命工作，筹办过平民学校，还到过饶阳、安平、磁县、顺德等地筹组过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登记处。牺牲时年仅二十岁。

（六）**许凤山**（1892—1927），天津人，住西门内大街，工人，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幼时读书，后来学商。“五四”以后，加入各界联合会及团体代表会，从事爱国运动。加入国民党后工作积极，热心革命，常到机关倾听革命道理，因而罹难。

（七）**徐建中**（1903—1927），原名延钟，又写彦钟、树钟，字秀平。天津人，天津放生院小学卒业，先在天津永丰酒店工作，后在营口创设钟生毛巾公司。后又回津在教育局师范班肄业，任模范小学义务教员，因从事革命活动，在义庆里四十号被捕。是否国民党员不详。^①

（八）**孙宝山**，唐山人（一说天津人），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在京奉路任司账。一九二六年在天津从事工人运动，曾组织铁路工会，虽遭军阀通缉，仍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就义

^① 据徐宗凯回忆：他的叔叔徐建中是1926年从沈阳回津后在河东李公楼一所小学任教，同时参加革命活动，终年二十八岁。见1984年5月20日《天津日报》。

时年二十九岁。

(九) 王鹤洲 (1900—1927)，天津人，住河东。庚子年间家遭联军破坏，移居复兴庄六条三十七号。他先在针市街荣庆里某大米庄工作，一九一九年在复兴茂大米庄（东门外扒头街）做事。后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外号叫“爱国迷”，牺牲时二十七岁。是否国民党员不详。

(十) 孙一山，籍贯不详。在天津安利洋行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各报投稿宣传革命，他还组织洋务党团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三月，作为天津代表之一出席国民党直隶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十一) 倪家志，浙江慈溪人，在天津安利洋行工作，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各报投稿宣传革命，他还组织洋务党团会，从事革命活动。遇难时年二十一岁。

(十二) 韩玉亭，在军界工作，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宣传革命。籍贯、年岁、家庭状况均不详。

(十三) 王建文，在军界工作，国民党员，在军队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生年不详。①

(十四) 马自芳，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大革命时期在津从事工运，在工厂组织工会，任干事，报纸虽然报导要逮捕他，他仍奋不顾身地从事党的工作，毫不畏却。生年不详。

(十五) 王益三，曾任军医，向士兵宣传革命。该烈士的

① 司呈祥同志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在一份有关烈士回忆材料中，写道，“该烈士是河南彰德人，天津北洋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洋纱厂工会主席。”

其他情况不详。^①

关于上述十五烈士的材料很少，有些文字记载有矛盾，有的文字记载与回忆有矛盾，作者作了些考证，加了些注释，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搜集材料，再加考证。

① 烈士碑文有王益三，但《十七烈士追悼录》中没有王益三，第十五名却是孙士彬。关于孙士彬写道：“孙士彬，男，直隶人，任医官于军界，自民国十四年（1925）入党以来，于医兵之际，即宣传主义，亟劝告兵士与群众结合，牺牲同上。年龄、家庭不详。”从事迹看，又象一人。王益三是否化名，尚待考证。

五四时期天津的爱智学会

孔 赐 安

爱智学会是五四运动后期在天津出现的一个文化学术团体。该会由当时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吕一鸣、孔赐安和棉业讲习所学生赵景深三人发起，宗旨是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但由于爱智学会是青年人凭一股热情办起来的，究竟要搞什么谁也搞不清楚。我们当时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在会章中把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娶小老婆做为会员们的共同信条。我们通过报纸宣传会章，很快有不少青年参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会曾与湖南的《湘江评论》有过联系，曾邀请过李大钊来会开座谈会。李大钊指出：无政府主义没有前途，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有力量，能实现自己的主张。

为了发表文章，我们曾找过天津《益世报》经理刘俊卿，要求他出版《新知识》副刊，他同意后，我们就给他写稿，持续约半年之久。后来我们自己出版过一期刊物，名为《微波》，内容大部分是文艺作品，也有一些介绍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

解放前国民党天津市地方 组织的活动概况

谢 天 培

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国民党在天津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九二四年前后国共合作时期，两党人士在京、津、冀一带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初北伐军进抵京津，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不久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至一九二九年又改组成整理委员会；“九·一八”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一九三五年订立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在华北之各级党部一律撤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着手恢复，转入敌后活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遂又公开组织，直至天津解放。为便于读者了解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组织及活动概况，笔者拟就以上各阶段加以综述。

本文资料除笔者亲历亲闻者外，又参照了胡梦华、赵静民、李卓然等人的回忆史料，还邀请曾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过的王嘉铭、刘正聘、李千元等进行座谈。综合各方面资料，整理成篇。遗漏或错误之处自所难免，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

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在天津建立组织，并联合各个革命组织，结合北方革命协会，创刊《民意报》进行鼓动宣传，起到唤醒民众的作用。为响应武昌起义，曾以天津为基地，部署，策动滦州新军第二十镇起义。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进而改组成中华革命党，这段过程在天津都有组织活动，不过不如同盟会时期活跃。中华革命党又改为中国国民党后，当时天津的党务受北京的丁惟汾等的领导，具体组织活动无甚可述。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华北各省市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直接受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北京执行部由国共两党人员王法勤、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等负责。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在天津的党务，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一九二四年秋季，筹建了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两个执行委员会，简称省、市党部，地址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两党人员合作，协力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为此，两党党员均可以个人名义，分别交叉参加两党组织。如两党领导人于方舟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国民党；江震寰是国民党员，也参加了共产党。天津国民党是公开的、有时也半公开的进行活动；共产党组织则是秘密活动。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共商国事。天津国民党党部散发大量传单，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号召国民团结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这时的天津是在“奉张”、